

协同治理、情法兼顾，看柯桥如何——

为外卖小哥系牢“安全带”

自《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》于7月1日实施以来，骑电动自行车需佩戴头盔成了热门话题。但相较于不少普通市民，浙江绍兴柯桥区的千余名外卖员却都能做到规范佩戴头盔。在《条例》实施后的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中，该区外卖员几乎没有被劝导整治的。

“这离不开柯桥交警的帮助。”美团、饿了么两个外卖平台的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虽然公司一直要求外卖员佩戴头盔，但仍难免出现佩戴不规范甚至不戴的现象。后来柯桥交警部门不间断上门培训，才让这一安全意识深入外卖员的脑海。

据悉，为改善外卖员因“赶时间”屡屡忽视交通法规甚至引发交通事故的现象，去年5月，绍兴柯桥在全省创新推行了以“交警查 平台罚”为核心的外卖送餐交通违法整治：一方面交警、美团、饿了么三方联手实施“最严执法”，让外卖员不敢“违”；另一方面通过常态化教育培训提高安全意识，让外卖员不愿“违”。

通过一系列情法兼顾、刚柔并济的举措，今年上半年，柯桥区涉外卖送餐交通违法同比下降了25%。“可以说效果很好，我们和浙江其他地市的交警部门对接时，大力推荐了柯桥的经验。”美团安全事务部浙江区负责人蒋新用表示。

7 严执法——违规三次 劝退封号

25岁的福建小伙汪诚，是美团外卖柯桥区轻纺城站的一名专送外卖员。当记者问他，是否因为抢时间而违反过交通规则，他笑着说：“以前还真有过。”

听说外卖员收入高，2018年汪诚辞职，加入外卖员队伍。可入行后他却发现，钱并没有那么好赚，“我们没有底薪，全靠跑单拿提成。一天工作8小时，真正赚到钱也就中午、晚上那一两个小时的用餐高峰期。”为了抢抓“黄金时间”，也为了不被顾客投诉，许多外卖小哥不惜违反交规来“争分夺秒”。

此外，不少外卖员安全意识淡薄，存在侥幸心理。“有时一个单子就在马路对面，或者在你刚骑过的地方，这时候你可能会想，横穿一下马路或逆行一段应该不会有问题。”外卖员小刘坦言。

行业监管缺位，也是造成外卖员骑行乱象的一个原因。“不是不想管，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！”蒋新用告诉记者，美团一直通过强化培训、设置违法监督员等手段，试图减少外卖员的交通违法行为，但由于外卖员数量多、流动大，这些举措很难起效。“我们在柯桥有450名外卖员，管理人员却只有那么几个，监管难度很大。”饿了么柯桥区负责人施华江也表示，类似的监管难题在游走于各大配送平台的众包外卖员（兼职外卖员）队伍中更加突出。

同样头疼的还有柯桥交警部门，因为几乎每天



柯桥交警向外卖员普及交通安全知识



针对外卖员的交通安全例会安全教育课

2 暖服务——交警贴心 骑手安心

“你们看，闯红灯多危险，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。”不久前，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法制教育“云”课程在柯桥上演，民警陈少杰结合具体案例讲解了闯红灯、逆行、随意调头、开车接打电话等交通陋习带来的严重后果。而视频那一头，新入职的美团外卖小哥一边认真听，一边不住地点头，“这还真是要注意啊。”

“这次培训主要是为了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观念，让他们带着足够的安全意识参加工作。”陈少杰说，不少刚入行的外卖员总觉得逆行和机动车道行驶不算什么大事，他们在老家也这么做。培训中交警会结合身边的实际案例告诉他们，这样做真的很危险，一旦引发交通事故住往得不偿失。

此前，柯桥一位外卖小哥雨天送餐不慎滑倒，打翻了顾客的餐品，因为害怕被顾客投诉，他选择逆行去餐厅换餐，结果遭遇了车祸。“最终的结果是，这位小哥不仅要承担巨大的损失，还要承受身体的痛楚。”陈少杰说，这样的案例让人痛心，却能击中外卖员的内心，帮助他们转变观念。

“处罚不是目的，也不是唯一的手段。”陈永虎告诉记者，想要杜绝外卖员交通违法行为，除了“最严执法”，还需要让他们意识到巨大的隐患，打心眼里不愿意违法。为外卖员送上“安全大礼包”已成为柯桥交警的常态化服务，截至目前柯桥交警已走进外卖站点开展安全培训近百次。除了理论教育，交警还会定期邀请外卖小哥走上街道，一起参与劝导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不文明行为，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。

交警的主动服务让施华江很高兴：“他们是权威人士，宣教起来更有说服力，效果也更好。”汪诚也表示，交警的安全培训确实有了效果，同事们的思想观念有了明显变化。“以前是‘以单量论英雄’，一闲下来，就是比谁跑得多。现在大家出门跑单，都会互相叮嘱注意安全，不要违反交通规则。”

更让人欣喜的是，频繁的交流让外卖小哥和交警的关系从“对立”变得融洽。柯桥区1200余名“美团小哥”自发组成“坊城义警美团骑手队”，在传递美食的同时，扮演起了治安巡逻员、信息传递员、平安宣传员的新角色。



柯桥交警、外卖平台联合组织外卖员开展文明安全出行宣传活动

经营正好转 帮扶不能停

寿光在二十个村试点『提级监督』

『正负清单』为村级小微权力『上锁』

“市里把我们村列入‘提级监督’试点，就好比给我们装了一个预防违规违纪的‘监控探头’。”7月8日，寿光市洛城街道六股路村党支部书记韩守国说。

据了解，2019年寿光市查处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中，基层党组织书记违规违纪问题不在少数。为加强对这部分村里“当家人”的监督，今年5月，寿光市纪委监委在全市7个镇街选取20个集体“三资”达到一定规模的村，从政治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和营商环境5个方面，对这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开展“提级监督”。

“纳入提级监督的村，多是城中村或改造村。我们统筹市镇村三级力量共同开展监督，有力有效预防了问题发生。”寿光市纪委副书记、市监委副主任洪光景说。

为明确村干部权力清单，寿光市纪委监委督促农业农村局、民政局等职能部门，全面梳理了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、征地拆迁、惠农政策等领域事关群众利益的事项，编制了小微权力运行“正面清单”。同时，寿光市纪委监委参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“六大纪律”，建立“负面清单”，为干部履职划清了“底线”和“红线”。“‘正负清单’等措施的运用，给这部分党组织书记手里的权力上了‘一把锁’，保证了小微权力始终用在服务上、处在监管下。”寿光市纪委监委二级调研员申元中说。

寿光市纪委监委还探索搭建“小微权力”智能化监督平台，为提级监督的村量身定制专属监督二维码。群众通过扫码可直观了解小微权力具体内容，还能对村干部工作作风、履职尽责方面存在的问题一键举报，实现村级小微权力“码上监督”。

“扫码举报配合改造升级后的‘阳光三农’综合信息管理监督系统，把监督的‘报警器’交到了村民手里，用‘大数据’手段实现了在线、动态、精准监督，让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可视、可控、可查、可纠。”寿光市纪委副书记、市监委副主任桑春晖说。

同时，寿光市纪委监委突出用好“闭环式”警示教育、“两书一单”等创新机制。“我们结合‘提级监督’，把‘闭环式’警示教育一并延伸到村级，通过开展送戏下乡廉政巡演、旁听职务犯罪庭审等教育活动，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，从思想上打消违规违纪的念头。”寿光市纪委宣传部部长杨超说，“找准警示教育与村级监督的结合点，形成经验后，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。”

寿光市纪委监委还在对口联系的各监督室建立了“提级监督”工作台账，对发现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研判，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，并运用纪检监察建议书和廉政抄告单等形式，督促有关单位加强管理、完善制度、堵塞漏洞。

大众日报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

街边的早点摊、奶茶店……这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个体工商户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今年以来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：消费需求不足、复工复产难、房租人工成本高企、现金流吃紧等。

近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，强调要“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”“要积极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租金、税费、社保、融资等方面难题，提供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”。那么，当前个体工商户还面临哪些困难？怎样才能渡过难关？

房租压力急需缓解

“最大的压力就是房租，一个月8000元，占到了收入的绝大部分。”醉初花艺花店店主杨爽告诉记者，去年4月份，她在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租下一家店面卖鲜花，以往生意还不错，遇到旺季一个月纯利润能过万元。杨爽计划着，再经营两三年，也许就能攒点钱换个更大的门面。

但一场疫情打乱了杨爽稳扎稳打的节奏。“春节本来是一年中最赚钱的时候，结果因为疫情直接关门歇业，只能眼看着备好的鲜花一朵朵凋谢。”两个月后，重新开业的杨爽发现，人流量大不如前。“以前一天能接待十几位顾客，现在也就两三位顾客，除了5月份有点微利，其他时候都在亏钱。”最让杨爽头疼的还是房租，“无论店里是亏还是赚，每个月8000元房租是硬支出，如果生意再不好转，真的很难坚持下去。”

记者采访发现，“房租”是个体工商户提及最多的难题。

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一家琴行老板娘李燕告诉记者，她的店铺每个月租金要1万元，2月份房东减了5000元租金，其他时间房租照付。“疫情期间，为了维持运转，我们全员降薪，但房租是逃避不了的成本。”

消费需求有待拉动

回忆起疫情暴发初期，广东深圳市宝安区甲钵常德士钵菜餐厅老板孙志仍然有余悸，2月份整整一个月不能营业，门面租金、员工工资、员工宿舍房租等成本一个月就要11万元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“现在生意正在好转，这个月来店里吃饭的顾客明显增多了。”但孙志发现，虽然深圳疫情防控等级早已降级，但客流量却始终未恢复如初。“以前店里的顾客大部分是周边一些工厂的员工，现在很多工厂还没完全复工复产，加上娱乐场所也没开放，客流量大减少。”孙志说。

与孙志一样，经济社会复工复产情况直接关系到诸多个体工商户的生存。北京人李莹辉几年前开设了个人摄影工作室，平时主要拍摄各种发布会、大型赛事活动，月收入有一两万元。“今年很多赛事取消，一些发布会改在了线上，只能给别人拍拍证件照维持生计，一个月勉强能赚一两千。”李莹辉感慨，国家进一步推动复工复产、拉动市场需求，自己的工作室才能“死里逃生”。

消费信心也待恢复。“疫情对我们培训行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招生，在以往的招



7月30日，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高坡民宿归原小镇内，前来旅游的游客在民宿小院里休闲娱乐。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

生旺季，我们一个月能招10多个学生，今年只招到一半。”李燕说，疫情让大家花钱变得谨慎，即使是给孩子花钱，也要精打细算。

此外，由于经营节奏被打乱，还有不少个体工商户现金流吃紧。银保监会的调查显示，个体工商户短期资金需求发生了变化：新增信贷需求旺盛，纾困、救急性贷款需求增加，短期内偿还贷款能力下降，还款压力增加。因此，及时给予个体工商户资金“活水”解渴，保证可持续的现金流迫在眉睫。

帮扶之外还要自救

面对困难，不少个体工商户选择以自救寻求突围。

有的个体工商户采取暂时关停线下门店及加强线上服务等方式。“虽然现在客流量在慢慢恢复，但我们还是准备把现有门面转让，寻找好位置重新开始。”湖南省邵阳县宾希法龙服装店店主曾思说，疫情

让大家习惯了网上购物，这个消费习惯一旦养成，对实体店的影响很大。为此，曾思也学着在朋友圈发打折促销信息，吸引新老客户。“但这不是长久之计，服装行业的玩法变了，我们也得跟着变，未来打算铺设线上渠道，加强线上经营，线上线下相结合。”

有的个体工商户采取拓展新业务、转向新领域等方式突破困境。“这几年自媒体、手机摄影对传统摄影行业冲击很大，我们这行去年就出现了下行苗头，只不过疫情又添了一把火。”李莹辉说，他在继续经营个人摄影工作室之余，也开始转型做自媒体，拍摄Vlog视频“吸粉”，希望做大视频号，以流量换取收入。

“疫情其实也为个体工商户推进数字化转型、开展线上商业模式提供了机会。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、教授盘和林认为，个体工商户要展开自救，还要拓宽融资渠道，做好现金储备，以应对潜在危机。 经济日报记者 李华林